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研究

□ 刘永红

2023年以来,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等国外金融机构相继倒闭,流动性风险再次成为银行及监管部门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外银行的破产风波,是对我国中小银行亟需加强流动性风险防范的警示。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硅谷银行破产根源进行梳理,深刻认识到中小银行必须主动求变,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工具,发现潜在风险,对症下药,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统一。

发现问题及问题根源

(一)硅谷银行的前车之鉴。硅谷银行是一家专注服务PE/VC和高科技企业的中型银行,经营优势在于投贷联动,从一家“小而美”的银行走向破产,从个体经营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风险意识淡薄。美联储“放水”让其存款飙升,但贷款需求疲软,只能配置大量证券资产,在资产配置逐步脱离自身核心业务的情况下,未在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方面留有空间。二是客户集中度过高。存款客户类型单一,且除了“私行”外几乎没有零售存款,无法通过分散化降低单一客群、行业的趋同行为引起的经营风险。三是压力测试不过关。在幅度和速度都远超预期的加息周期里,其未曾自行开展流动性压力测试,导致潜藏的流动性风险未被及时识别。四是危机公关不到位。在其发布的股权融资公告中,只披露了已经发生的交易和亏损,没有展示未来的交易计划以及预期损益,引发投资者担忧,最终引发挤兑。

(二)国内中小银行流动性管理不

足之处。一是管理层认识不到位。大部分中小银行对流动性风险重视程度不足,往往依赖于外部监管,满足于静态监管指标的良好表现,缺乏从自身长远发展出发对流动性风险管理提高的探索。二是日常管理待加强。日常管理方面,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指标体系等也有待完善和加强。部分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商银行,流动性技术水平比较薄弱;在监管指标外,缺乏具有特色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未做到技术现代化,也未做到预警常态化。三是互助机制不完善。当前,中小银行流动性互助以临时性互助为主,往往未制定明确的实施细则和管理方式,一旦发生风险能否及时实施运作仍属未知。此外,互助成员之间业务单一化、经营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经济下行期的金融风险往往是系统性的,一旦发生大范围风险,互助联盟中的成员银行可能自顾不暇。四是舆情管理待提升。中小银行虽定期开展流动性应急演练,但演练场景以营业场所发生挤兑、客户大额存款流出为主,演练的重点主要在于营业厅、金融市场部等相关部门,在统筹舆情管理方面还未进行全面深入探索。

(三)全系统流动性管理面临的挑战。浙江农信系统正处于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且贷款增幅远高于存款增幅。浙江农商银行近三年总资产年均增速达到16.82%,存款规模年均增速为16.39%;贷款规模年均增速达到20.83%,比存款高出4.44个百分点;存贷款规模增速的不匹配势必会压缩同业资产配置的空间。相对于流动性较高的各类存款和债券,贷款的流动性要差得多,债券资产配置空间受限,

也就意味着各行社在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过程中,更加要注重前瞻性和精密性。

具体应对举措

(一)强化流动性管理履职。明确组织架构,强化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的履职,强化“三会一层”对流动性风险管理“自上而下”的指导力度。同时,通过建立健全流动性管理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及必要的监督考核机制,确保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落地。

(二)加强前瞻性管理。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细化资产负债结构分析,加强缺口管理,建立更加合理有效、全面立体的流动性指标监测体系,对流动性风险及时预警,并在经营决策中充分考虑管理工具给出的定性或定量结果。

(三)完善应急预案。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风险偏好完善流动性应急预案,预设好流动性风险发生后的有效处置预案,尤其注意舆情管理,并定期开展演练,确保应急预案切实可落地。

课题成果及下一步转化思路

(一)阶段性成果。依托浙江农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理念和工具,北仑农商银行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而明确的组织架构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有效支撑。在国外银行倒闭风波发生后,北仑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在资产负债管理小组会议上进行专题探讨,对照国内外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查漏补缺,制定提升方案。目前,主要在流动性监管指标前瞻性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一是年度

指标计划。搭建了流动性指标计划模型,将业务管理维度与关键流动性监管指标形成映射关系,实现对未来一年每月流动性指标的测算,引导金融市场部以“助执行,守限额”为首要目标配置各项资产和负债,引导业务部门提早对增量贷款的期限结构进行“摆布”。二是月度指标监测。对存款规模在1000万元以上客户的月末资金进出规律进行摸排,并加强月度指标的监测频率,预测月末流动性指标情况,及时调整期限结构。

(二)下一步转化思路。一是优化考核机制。持续探索优化机构、条线流动性风险管理考核机制。机构层面,主要对大额资金报备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进行考核;条线层面,在监管指标的基础上设立内部管理指标,如投资业务中债券的期限与比例、存款各项期限规模的增长匹配率等。同时,丰富流动性风险限额指标体系,由流动性管理部门根据内部决策和外部市场发展变化进行分配,并开展考核,确保各条线在限额内开展各项业务。二是优化压力测试。在针对流动性缺口率进行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以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为核心的压力测试体系,通过压力测试模型修正和基于历史数据分析的动态现金流分析预测模型,并结合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抵质押情况定期测算结果,主动前瞻性管理所需优质流动性资产的规模。三是优化应急演练。持续优化并开展流动性应急演练,提升全行各部门和各机器的参与度,使相关人员熟悉了解流动性风险应急处置程序,特别是在舆情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流动性突发事件发生时所造成的损害。(作者系北仑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融科技赋能“加速跑”的实践路径

——以义乌农商银行为例

□ 蒋彬彬

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本质是科技赋能金融行业,起到延展客户群、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性,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效能的作用。为赋能金融科技“加速跑”,近年来,浙江农商银行辖内义乌农商银行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与探索,通过持续深耕金融科技领域,不断加大对科技人才的培育和扶持力度,积极推进“政银”协作,加强产品服务创新,深化融资对接,优化资源配置,为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的科技型企业提供高效、便捷、优质、全面的金融服务。截至今年2月末,共向当地科技型企业提供了69.04亿元贷款支持。

着力强化党建引领 凝聚“政银”共建发展合力

义乌农商银行早在2019年便与义乌市科技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党建合作、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业务方面开展合作,并向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经认定的人才企业及企业主提供综合授信5亿元。2024年初,义乌农商银行与市科技局升级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搭建“党建+平台”平台,向全市科技型企业 and 科创平台提供综合授信100亿元,着力支持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和“高能级科创平台”,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打造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财政科技经费申请、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金融创新发展展示单位;积极承办由市科技局、市工商联等部门组织的义乌市“科技三服务·亲清直通车”融资对接会,并与市科技局联合开展企业“三服务”活动,“政银”联动赋能科技企业升级发展。

着力升级产品服务 增强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动能

义乌农商银行与义乌市科技局共同搭建合作平台,推出“科创贷”专属贷款产品,向平台内的科技型小微企业、人才企业提供融资、融信等金融服务,并持续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将信用保证类贷款额度提高到1000万元。同时,义乌农商银行积极开展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等业务,全方位拓宽融资渠道,满足科技

企业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不同发展阶段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如某运动服饰公司主要经营针织运动服装等的生产销售,经过多年的发展,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为某些国际知名品牌代工。该企业还积极加强品牌建设和产品功能创新,申请注册了自主商标,自主研发了具有吸汗功能的瑜伽服等运动类专利产品,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在多元化转型升级过程中,该企业亟需资金注入和融资保障。义乌农商银行“因企施策”,为其制定针对性的融资服务方案,根据其“高新技术企业”的身份,提供专属信贷产品“科创贷”,并给予其500万元的贷款支持,充分满足了企业流动资金需求。

着力打造“伙伴生态” 厚植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沃土

义乌农商银行积极搭建数字化服务体系,将“移动展业”PAD融入科技企业常态化走访活动中,开展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通过精准定位、自动分配、数据筛选等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对接效率;通过举办辖内企业家座谈会、产业园启动会等,扎实开展惠企政策宣传,并以常态化走访活动为载体,深入小微

园区、产业园区等,逐户开展科技企业走访,对市科技局推送的1899家科技型企业实现了走访对接全覆盖,“一企一策”量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同时,该行积极配合市科技局向辖内科技企业做好科技贷款贴息奖励政策的宣传与落实,确保惠企政策精准触达企业。截至目前,该行已配合完成65户科技企业的贴息业务,总金额239.86万元,涉及贷款1.94亿元。如某帽子生产企业,年产能超1600万顶;该企业持续注重产品设计和品质提升,在研发投入大量成本,并引进3D技术将设计、生产时间升级为数字化车间。为支持该企业发展,义乌农商银行为其提供了500万元“科创贷”,在给予专属利率优惠的同时,积极为其争取财政补贴5万元,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经过实践与探索,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加快建立完善的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推进科技金融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地助力科技企业茁壮成长。(作者系浙江义乌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银行业金融机构盘活存量不良资产的思路和对策研究

□ 黄鹤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当前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从“增量扩张”思维向“存量盘活”思维转型,坚持一手抓增量市场,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手抓存量市场,切实优化现有业务结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盘活存量不良资产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主动迎接“存量时代”面临的新挑战、新困难、新问题,全力压降历史包袱、化解消除存量风险,全力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

不良资产的基本概念与分类依据

(一)基本概念。按照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相关规定及管理方法,银行业金融资产共分为五大类,分别为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其中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统称为“不良”。(二)分类依据。2020年7月1日起,原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制定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以下简称:《分类办法》)开始施行。根据商业银行风险分类工作真实性、及时性、审慎性和独立性“四大原则”,为促进商业银行准确评估信用风险,真实反映金融资产质量,根据新的《分类办法》,金融不良资产核心要义分别如下:一是次级类。债务人无法足额偿付本金、利息或收益,或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二是可疑类。债务人已经无法足额偿付本金、利息

或收益,金融资产已发生显著信用减值。三是损失类。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后,只能收回极少部分金融资产,或损失全部金融资产。同时,《分类办法》还明确规定,对于以下四种情况的金融资产至少划归为次级类:一是本金、利息或收益预期超过90天;二是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三是债务人或金融资产的外部评级大幅下调,导致债务人的履约能力显著下降;四是非同单一零售债务人在所有银行的债务中,逾期超过90天的债务已经超过20%。

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周期转换的影响。从经济发展周期来讲,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经济发展,我国先后推出了数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我国经济增速和民生就业得到了保障;但在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下,使得企业对经济形势判断过于乐观,传统行业例如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过度投资产生的产能过剩、转型滞后,叠加疫情影响和国际经贸环境恶化,导致市场供求形势逆转,行业下行压力加大,经营效益下滑,信用风险上升,进而传导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不良资产。(二)金融机构转型的影响。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与收益相伴相生。从金融机构发展路径来看,前些年金融机构在宽松的信贷政策支持下,释放出高能的市场活力,为了实现快速增长和扩张,不乏出现“短贷长用、恶息联保、高评高贷”的情况。在具体业务形式上,也出现了

信托、资管、理财等“影子银行”的产品形式,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风险隐患的产生。但随着经济回归理性,商业银行风险隐患逐步暴露,在宏观调控措施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始缩减信贷规模、提高准入条件、降低押品折扣率,以此防范信用风险,一系列措施导致高杠杆运行的企业出现财务风险,“银企”关系逐步紧张,不良贷款出现“双升”,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只能为自身行为“买单”。(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阵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由房地产土地财政向高质量发展之路转变。据统计,诸多银行房地产信贷业务不良率在5%左右,远高于平均不良率。截至2023年6月末,全国18家重点上市银行(包括6家国有大行、10家股份制银行和两家城商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共计2970.26亿元,较2022年末增加209.32亿元,房价逐渐回归理性,房企利润下滑无法支撑高额资金成本,资金链日趋紧张,大量投向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信贷资金出现逾期,涉房类不良信贷资产高企。

盘活不良资产的思路和对策

(一)突出重点,有的放矢。要压实存量金融资产管控责任,明确重点行业领域,合理控制公司类存量风险业务,可加大贷后管理力度,借助大数据等智能数字化手段,深度分析业务情况,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在风险暴露后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对于有经营价值的企业,银行和监管部门要主动介入,通过债权委

员会牵头债务重组等方式,统一行动,实现资源整合,帮助企业自救脱困;对于已启动司法清收程序的客户,要依法合规解决问题,通过破产重整程序等手段,帮助企业脱困,最大限度降低银行损失;对于普惠存量信贷业务,要根据实际情况,分类施策,充分体现金融的政治性和人民性,惠民有感;对确因经济周期性波动或偶发性投资失败导致短暂时资金困难,但诚信经营、还款意愿积极的债务企业,银行可综合使用信贷支持、利息减免、延长付息周期、贷款本金展期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对于恶意逃废债的企业或个人,银行要提前介入,提早摸清存量资产负债情况,及时采取司法保全措施,避免国有资产损失。

(二)制度先行,规范清收。不良资产盘活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在盘活存量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很可能涉及到银行、投资人、资产公司、债务人、担保人等多个方面,关系错综复杂,部分案件还可能涉及案外人为了生存权等切身利益,主动或被动参与到处置过程中的情形。因此,健全的制度设计,是处置盘活不良资产的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护航不良资产盘活工作,长远可持续健康地开展。在制度设计方面,至少应该具备完善的不良资产管理考核机制、奖惩机制、清收机制、转让机制、退出机制、审批机制、监督机制和人才机制,尽可能让每一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实现不良资产清收盘活业务的合规健康发展。

(三)敢于创新,多措并举。目前不良资产清

收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种是司法清收,一种是债权转让或重组清收。在司法清收方面,主要依赖于法院力量,通过强制执行,以物抵债、债转股等方式实现现金回收。但此方式往往对债务人打击较大,对债权人同样也会产生较大损失,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在债权转让方面,目前主要依赖于“五大全国性金融资产转让公司”和60家省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相较于目前的不当资产处置方式,以上两种方式消化能力是不足的。

成功的不良资产盘活,需有不同的投资主体为不良底层资产提供资金、技术、人员、资源等全方位的支持,需要金融力量和产业力量相互配合,使各方资源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市场上合理匹配、各司其职、各取所需,以此达到平衡协调的发展。因此,在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方法上,除传统的非诉催收、司法清收、破产重整、破产清算、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还可借助与属地地方国企合作优势,更好发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用,打通“银政企”合作渠道,争取地方政府的认可和全力支持;同时,加强资源统筹调度,高效协同银行同业机构、律师事务所、咨询机构、评估机构等相关经营主体,加大与属地国企合作深度,在政府债务化解、非标业务转化方面取得更多资源倾斜。此外,还要尽可能降低融资成本,通过利率互补、引入战略投资人、招商引资、注入资本金等方式盘活存量不良资产,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银政企”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盘活不良资产。(作者单位:重庆三峡银行)

创推「乡情联络员」工作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以大冶农商银行为例

□ 董长虹

为全力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近年来,湖北大冶农商银行主动扛起农村金融主力军、“乡村振兴主办行”责任,在迭代派强“金融村官”的基础上,增设“乡情联络员”一职,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取得较好的前端成效。

工作背景

(一)中央有号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强调“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作为“农”姓银行,做好普惠金融农商银行责无旁贷。

(二)省级有要求。近年来,省联社积极引导县域农商银行聚焦主责主业,下沉服务重心,推广“金融村官+整村授信”等新模式,有力地支持了荆楚大地乡村振兴。

(三)机构有变动。根据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改革要求,不再保留县级支行,人民银行大冶市支行职能上收至人民银行黄石市分行,为保证管理力度不降、服务效能不减,持续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力量,有必要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发展。

(四)基层有难题。一是人员力量不足。目前,大冶农商银行派驻的“金融村官”只有63人,存在“人少村多、一人多村”的情况,影响了服务质量。二是人员流动性强。担任“金融村官”的客户经理和支行长存在1至3年的轮岗期,岗位的频繁变动不利于营销服务的稳定性。三是服务乡村振兴不够。派驻“金融村官”多为“自上而下”安排式,工作重点在授信上,对产业振兴帮助较少,带动作用不明显。据此,在由镇及村层面,必须找到一个稳定、可靠、有效的人员对基层服务力量进行补强。因此,“乡情联络员”模式应运而生。

主要做法

(一)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变“分镇包保”为“返乡服务”。针对大冶市15个乡镇(街道)、322个行政村,大冶农商银行将341名在职员工,根据本人(或亲属)的籍贯,对全市322个行政村逐一进行认领,担任所在村“乡情联络员”,在“一镇一‘金融村官’”的基础上实现“一村一‘乡情联络员’”。与传统“自上而下”地派驻“金融村官”相比,“乡情联络员”本质上是“自下而上”选择产生,其服务范围为本人所在家乡,具有无可比拟的“人缘、地缘、亲缘”优势,“乡情联络员”出于对家乡的了解和对家乡的感情,更容易提升服务质量。

(二)以农户需求为核心,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一是围绕服务“零距离”。“乡情联络员”利用节假日等空闲,回到家乡亮明身份,全面收集群众相关需求,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人群,“一对一、点对点”地提供直接服务和“帮代办”服务。同时,通过大冶农商银行各类资源,精准解决农户关心的社保、农业补贴、农产品销售等问题。二是围绕农户“零诈骗”。针对农村地区电信诈骗高发、频发问题,常态化开展反诈培训、反假宣传以及征信辅导、业务问题解答等活动,向农民群众普及基础金融知识。截至目前,该行累计下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24场,为广大农民群众换发第三代社保卡1.7万张。三是围绕征信“零不良”。加强与挂点村村“两委”深度合作,推动“乡情联络员”逐户摸排、走访建档,做实整村授信工作。2023年,该行新增整村授信授信农户7333户,新增授信1.5亿元,较上年同期提升130%、102%。同时,该行依托“乡情联络员”加强反诈电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宣传力度,引导农民群众使用正常贷款渠道,做到不良征信“防患于未然”。截至目前,该行已精准匹配全市各行政村农户基础信息50.54万人,乡村农户覆盖率达到90%以上。

(三)以信息平台为支撑,变“沉数据”为“云上财富”。整合“乡情联络员”采集信息、本行积累账户数据等多个渠道信息,建立起大数据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无形资产有形化,有形资产数据化”。依托大数据服务平台以及手机银行,“楚天贷款码”“301”模式等数字金融工具,通过授信模型自动生成授信额度,让广大农户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的融资服务。截至目前,该行已授信农户5.85万户,授信金额22.07亿元。

成效及启示

(一)有效助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乡村治理。随着“乡情联络员”下乡宣传,农民和涉农经营主体的金融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有效提升,受诈骗群体也有效减少,农村整体信用环境也相较稳定,因资金引发的矛盾相应减少,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乡村有效治理。

(二)在农村金融共建共享上做出了积极探索。大冶农商银行将“乡情联络员”作为“村银”共建和整村授信的纽带,实现了“农银”之间的双赢。对于农民群体来说,金融服务实现了“家门口服务”,便捷化咨询办理。对于银行自身发展来说,不仅大幅增强了与广大农民客户之间的黏性,保持了农村服务队伍的稳定性,打牢了基层网点基础,也拓宽了微贷营销渠道,夯实了微贷主业。截至今年3月末,大冶农商银行涉农贷款投放比年初增长6.42亿元,其中由“乡情联络员”牵头搭桥的有1.35亿元,占比21%。

(三)金融带动农村产业发展初见成效。“乡情联络员”不仅熟悉乡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农村产业发展情况。大冶农商银行通过“乡情联络员”能够掌握农村产业发展真实金融需求,对有需要的农村产业灌溉金融“活水”。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发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71笔、金额2.08亿元,发放“农担贷”17笔、金额1469万元,发放“渔家乐”4笔、金额36.72万元,发放“农担接力贷”5笔、金额474万元,发放“新农快贷”12笔、金额655万元。这些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农村产业发展,效益正在逐步显现。

(四)以点带面推动了人才、作风、形象宣传工作。“乡情联络员”除了积极的外部效应,对加强银行自身建设和机关管理也有所裨益。一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将广袤的农村作为提升员工能力的“练兵场”,为“后继有人”打下了基础。二是在作风转变方面。全行员工在深入基层时受到了教育,重新涵养了农信“挎包精神”,提升了为民情怀,锤炼了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三是在形象宣传方面。“乡情联络员”成为农商银行无形的财富和无形的广告,进一步深化了品牌内涵,对于农商银行长远发展颇有好处。(作者系湖北大冶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